

## 作者簡介

葉正渤，江蘇省響水縣人，教授，文學碩士。1988年6月陝西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赴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講師。1995年2月調入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1997年7月晉升為副教授，2003年8月晉升為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古代漢語、古文字學、古漢語詞彙學和先秦兩漢文獻教學與研究。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通訊評審專家、成果鑒定專家。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獎評審專家。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者。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項，後期資助項目一項，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一項，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一項，江蘇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項目二項，江蘇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項目二項。發表學術論文、譯文100餘篇，參加《中國書院辭典》的編寫，和李永延先生合著《商周青銅器銘文簡論》（1998，1999年獲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評選三等獎），另著《漢字部首學》（2001）、《漢字與中國古代文化》（2003）、《金文月相紀時法研究》（2005，2008年獲江蘇省高校社科成果評選二等獎）、《上古漢語詞彙研究》（2007）、《葉玉森甲骨學論著整理與研究》（2008，2011年獲江蘇省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選二等獎）、《金文標準器銘文綜合研究》（2010，2012年獲江蘇省高校社科成果評選三等獎），點校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2013），《金文四要素銘文考釋與研究》（2015，2016年獲江蘇省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選三等獎），《古代語言文字學論著序跋選編》（合著，2015），《金文曆朔研究》（2016），《〈殷虛書契後篇〉考釋》（2018）。

## 提 要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與語言研究》是一部對西周武王成王（含周公攝政）時期鑄造的銅器銘文和語言文字進行研究的專書。研究內容既包括對武成時期所鑄銅器銘文的體例、特徵做分析總結，也對武成時期銘文作考釋，並對武成時期金文文字特點作分析總結，還包括對武成時期所出現的金文新字與新語詞作分析探討，盡可能作出正確的解析。論著共分五章：第一章相關研究背景回顧，第二章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考釋，第三章武成時期銅器銘文的特點，第四章武成時期金文文字特點，第五章武成時期新字、新語詞探析。在以上五個方面論著都取得了預期的研究成果。

# 序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與語言研究，是指對西周武王、成王（含周公攝政）時期鑄造的銅器銘文和語言文字進行研究，既包括對武成時期所鑄銅器銘文的體例與考釋，也包括對武成時期所出現的金文新字與新語詞的研究。這是金文研究的兩個方面，它是由金文本身的內容決定的。從研究方面來看，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唐蘭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等著作，主要是對銅器銘文的考釋和歷史斷代，其中也包括對銘文中金文單字的考釋研究；而周法高的《金文詁林》及其補編，則完全是對單個金文字的考釋與研究。以上所舉資料足以證明金文研究所包含的基本內容，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與語言研究也主要指這兩個方面的內容。

西周乃至整個周代青銅器銘文大約有三千多件，為何僅僅選取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與語言進行研究？這是因為武王最終滅掉暴虐的商紂王、建立起西周王朝的統治，天下國家處於改朝換代、百廢俱興的開端。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銅器銘文中有記載。

成王，即位時尚未成年（朱駿聲《尚書古注便讀》考證說是十三歲），由其叔父周公旦攝政，此時正是處於鞏固西周王朝政權的關鍵時刻。一方面，商的遺老們懷念故國舊君，心裏不服西周王室的統治，武庚祿父作亂叛周，孤竹國國君之子伯夷、叔齊寧可餓死首陽山也不食周粟，就是有力的證明。

另一方面，王室內部武王庶弟對周公攝政心懷不滿，散佈流言蜚語，造成人心不穩，對王朝的統治也極為不利。在這兩種情況下，終於爆發了武庚祿父與三監之亂。商紂王之子武庚祿父與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作亂，周王朝面臨嚴峻的形勢。在這種形勢下，周公以成王之命率師東征，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廢霍叔為庶民，平定了三監之亂，使周王朝的統治得到鞏固。這在當時是一個重大事件，所以在王室和貴族大臣所鑄的銅器銘文中都有記載。

商王朝滅亡，西周王朝建立，社會處於重大的變革時期。各種舊的不合時宜的典章制度要廢除，新的典章制度需要建立，所謂革故鼎新是也。周王朝處於繼往開來，開啓一個新時代的狀態。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一個新的王朝、新政權的建立，必須與舊的王朝、舊政權不一樣，給人們以面貌一新的感覺，這樣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否則，改朝換代有什麼意義呢！周王朝及王室既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逸周書·周月》：「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這就是我國古代各個朝代的建立，在典章制度方面與前朝皆大有不同的原因。據傳世文獻記載，周公且在這方面有很多建樹，發揮了很大作用。這一點，在武成時期的銅器銘文中也有所反映。

在語言文字方面，根據出土的商周金文來看，武成時期雖然直接繼承了商代語言文字的主要特徵，但是，也有革故鼎新，有較大的發展。這就要求對武成時期的銅器銘文作深入細緻的分析探討，瞭解周初武成時期在語言文字方面的發展演變狀況。這是本成果研究的重點，也是本成果選取武成時期銅器銘文作研究對象的重要原因。

關於開展漢字發展研究的重要意義，黃德寬先生在其《古漢字發展論》一書中寫道：「開展漢字發展研究的首要意義，就是有利於更好認識漢字發展的歷史規律，促進漢語文字學的理論建設」。他說，從漢字發展角度認識到以下幾點：

一是漢字發展的延續性和漸變性，二是不同歷史階段漢字發展呈現出不同

的特徵，三是漢字系統的層累性特徵。(第 20 頁)

本書的研究涉及諸多方面，在研究過程中的確有所創見、有所收穫。現略舉數例。

### (一) 提出了武成時期普遍存在的所謂商器周銘的判斷標準與方法

所謂商器周銘，是指既有商代銅器器型紋飾特徵和銘文元素，同時又有武成時期銅器銘文才有的某些元素，這些銅器貌似商器，實為武成時期所鑄。對其所屬時代本文提出以下判斷標準。

1、銘文中既有商代銅器銘文的元素，同時又有武成時期銅器銘文才有的某些元素，這是商代遺民而歸附於周王室者所鑄之器。因為器型紋飾具有漸變性，所以主要根據銘文作出判斷。

所謂商代遺民，是指武王克商後商王朝遺留下來的貴族大臣，也即《尚書·多士》周公所說的「惟爾多士」。這些商王朝遺留下來的貴族成員往往掌握著商王朝先進的文化知識，具有一定的統治經驗或軍事才能。這些人當中願意歸附於西周王室且願意效力者，因而為周王室所用，傳世文獻稱其為殷遺，本文稱其為商代遺民。所以，在這些商代遺民所鑄的銅器銘文中，一方面保留了很明顯的商代銅器銘文的某些特徵，另一方面也具有武成時期銅器銘文才有的某些元素。

如銘文置於亞形框內，有商代銘文特有的族徽，以十天干字作亡父或亡祖的廟號，紀時置於銘文之首，且只有干支，或加月份，有些還用商代特有的周祭字「彡(彤)、翌(翊)、祭、嘗、魯(協)」，紀年用「祀」字，置於銘文之末。這些是商代銅器銘文所具有的特徵。如果銘文中所記載的事件屬於武成時期的，如侯國名、職官名等，那麼這樣的銅器銘文是商代遺民而為周王室所用者所鑄。

再如，沐司徒疑簋銘文，銘文中既有 (田) 族徽， 也見於商代銅器銘文；而疑所擔任的司徒一職，是周初武成時期才設置的職官名；銘文所記事件「王來伐商邑，誕命康侯鄙于衛」，這是成王時發生的事件，所以，這些都說明沐司徒疑是商代遺民而歸附於周王室者，而沐司徒疑簋及銘文一定鑄於成王時期。

又如，旂鼎二銘文仍使用族徽「析子孫」，用日干作亡父的廟號，但銘文

同時又用成王時期才有的「初吉」「辰在某某（干支）」的月相詞語紀時，說明此器之鑄只能在成王時期，而非商代晚期，旂也是商代遺民而歸附於周王室者。

2、銘文中沒有十天干字爲亡父或亡祖作廟號，亦沒有族徽符號的，一般屬於周初武成時期或其後所鑄之器。這是判斷商器抑或周器銘文的重要標準之一。

例如，明公簋銘文，因爲明公（周公旦之子）是地道的周王室家族成員，故其所鑄銅器銘文除了字形字體沿襲商代晚期特徵而外，沒有商代銅器銘文的其他烙印和元素。當然也可能有例外。例如匱侯旨作父辛鼎銘文「匱侯作父辛奠」，據考證匱侯旨是召公奭的三兒子，而召公是姬姓，銘文中稱其廟號爲父辛。這是很特殊的。

3、西周職官名。如果武成時期才設置的職官名，出現在具有商代器型紋飾特徵和銘文元素的銘文中，那麼這件銅器銘文一定是商代遺民所鑄。如前舉的沐司徒疑簋銘文中的司徒之職，是武成時期才設置的職官名，毫無疑問，疑是商代遺民而歸附於周王室者。詳閱正文。

## （二）辨識了某些字的結構和新字

辨識了武成時期銅器銘文中一些字形的結構，或歸納、解析了所出現的一些新字。

例如：揚鼎銘文中的（揚）字，從𠂔（雙手上揚形），從玉，一般讀作「揚」，銘文是人名。根據集成 02612 銘文，「揚」字似從戈從𠂔，而何簋銘文似從𠂔從戈從衣。但是，集成 02613 銘文很清楚是從玉從𠂔，象人奉玉之形，故知「揚」字本從玉，而有頌揚之義。集成 02612 銘文所從的戈，實際是串玉的象形，只不過上下寫出頭了，致使後人誤以爲從戈從𠂔。奉戈頌揚，於理於義難以解釋得通。

發現武成時期銘文中出現的新字，如：玟、珣、征、福、違、復、匱、奄等等，詳細解析請參閱正文。

## （三）發現武成時期出現的新詞語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了武成時期才出現的一些新詞語。例如，

1、職官名。有事，見於利簋銘文；司徒，見於沐司徒疑簋銘文。

2、月相詞語和其他紀時詞語。如：初吉、既望、既生霸和既死霸，辰在某某（干支），月吉等。

3、以事紀年。殷成周年、公太保來伐反夷年、見事於某年。

以事紀年，對於鑄器者來說一般都是受周王的重大任命，值得終生紀念才鑄器鏤銘，故以事紀年，作為一種榮耀，流傳於子孫後代。

例如「殷成周年」，郭沫若說，殷見之禮即大會內外臣工之意，唐蘭謂諸侯同來朝會的名稱。《說文》頁部：「殷，作樂之盛稱殷。」引申有「盛大」義，可見「殷見」之說是根據《說文》的解說。根據銘文，奉命前往成周接受殷見之人往往是貴族大臣而不是周王，因其奉周王之命，所以殷見「內外臣工」或「諸侯同來朝會」。本文以為，銘文「殷成周年」當是指周王室遷殷頑民到成周以後，專門派員前往安撫商代遺民的意思。因授命之事意義重大，故奉命之貴族大臣特鑄銅器銘文記之以為榮耀。

又如旅鼎銘文「公太保來伐反夷年」，這是很值得紀念的重大事件，旅參與其事，故鑄器鏤銘，以事紀年，作為榮耀。

4、客套語。武成時期銅器銘文中的頌詞只講「揚王休」，而不講「對揚王休」。

#### （四）根據武成時期出現的金文新字糾正《說文》的錯誤

匱：、、（匱侯簋、匱侯盂、堇鼎、圉鼎、圉簋、伯矩鬲、攸簋、復鼎、復尊），寫法相同，皆從匚晏聲。《說文》匚部：「匱，匿也。從匚晏聲。」從武成時期金文來看，「匱」字當從匚（yīn）晏聲，不從匚（xǐ）。

寧：（盂爵），《說文》宀部：「寧，願詞也。從宀寧聲。」小篆字形結構與武成時期金文完全相同。根據《說文》的解釋「寧」字表示心願，故當從心，寧聲，當歸心部，不應歸宀部，《說文》歸部失誤。

賞：（小臣傳卣），（御正衛簋），從貝商聲，「商」字「庚」下有「口」。（攸簋），（壘鼎），（堇鼎），（復鼎、復尊），（商尊、商卣），後幾例聲符「商」下減省「口」，但攸簋「賞」字的聲符「商」有兩顆星，總之都是從貝商聲。《說文》貝部：「賞，賜有功也。從貝尙聲。」武成時期金文是從貝商聲，戰國時期金文（中山王壺等器銘文）改為從貝尙聲，小篆沿襲的是戰國時期的字形。

敢：（旂鼎），從爪從口從又。《說文》受（piǎo）部：「進取也。從受，古聲。」金文爪下從口從又，不從「古」聲。

叔：（叔簋一、叔簋二），從丑從未。《說文》又部：「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名收芎爲叔。」《說文》從又，「又」是手的象形；武成時期金文從丑，「丑」是手指的象形，因而可以通用。但是，「未」乃象豆其上籽粒散落形，在「叔」字中並非是聲符，而是義符。《說文》未部「未，豆也。象未豆生之形也。」《說文》解「未」字「象未豆生之形」也是不對的，應是象未豆散落形。可見武成時期金文「叔」是會意字，《說文》解釋爲形聲字，誤。在西周銅器銘文中表示排行伯仲叔季的「叔」，是借用問終義的「弔」，不用「叔」字。

#### （五）糾正前人的某些說法

前人關於武成時期金文的說法涉及面比較廣，有關於銅器銘文歷史斷代的，這方面存在的爭議最多；有關於銘文解讀的，有關於文字詞語考釋的，有關於歷史人物和地理的，等等。具體案例請參閱正文相關章節。

#### （六）研究方法多樣

1、人名系聯法。原理是：不同銅器銘文中出現相同的人名，那麼這些銅器銘文屬於同一時期所鑄的可能性最大，或相近時期所鑄。本文運用人名系聯法，得到成王時期約略可驗證且有文字材料價值的銅器銘文 100 餘件。這是本成果研究的基本材料。

2、歷史比較法。一是將武成時期的銅器銘文和金文單字與商代晚期文字相比較，提出武成時期銅器銘文在體例章法結構方面的發展演變和特徵，同時發現武成時期若干金文新字和新語詞。二是將金文單字與《說文》小篆相比較，分析金文單字的構造，糾正《說文》說解的某些錯誤。

3、運用不完全邏輯歸納法進行研究。總之，本文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並有所斬獲。

作者 謹記

丁酉年夏至（2017.6.21）



# 目 次

序	
第一章 相關研究背景回顧	1
第一節 前之學者的有關研究	1
第二節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的判定	6
第二章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考釋	11
第一節 武王時期銅器銘文考釋	12
第二節 成王時期銅器銘文考釋	18
第三節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和族徽	142
第三章 武成時期銅器銘文的特點	161
第一節 銘文體例與篇章結構的特點	162
第二節 武成時期商代遺民所鑄銅器銘文的特點與判定	171
第四章 武成時期金文文字特點	175
第一節 武成時期金文文字的構形特點	177
第二節 武成時期金文文字的體態特點	186
第五章 武成時期新字、新語詞解析	193
第一節 新字解析	193
第二節 新語詞解析	202
第三節 武成時期賞賜名物與賞賜類動詞	209
參考文獻	219
附錄	221
(一) 材料出處表	221
(二) 本書作者古文字研究論著論文目錄	222